

第一卷

群经概论

范文澜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卷之二

范文瀾全集

范文澜全集

第一卷 群经概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范文澜全集/范文澜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1

ISBN 7-5434-4973-0

I. 范… II. 范… III. ①范文澜-全集②史学-
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4323 号

书 名	范文澜全集 (共十卷)
作 者	范文澜 著
责任编辑	王亚民 张惠芝
装帧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43.5
字 数	3385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973-0/K·225
定 价	5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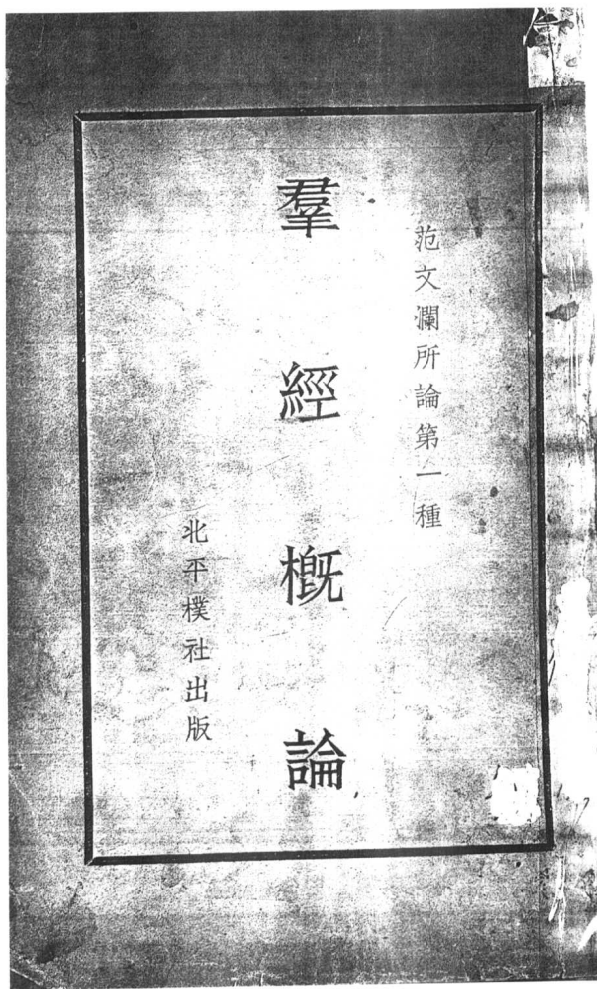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留影



一九三三年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同人合影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校址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群经概论》书影

出版说明

(一)《范文澜全集》收入已刊著述十一种，文章五十八篇，分编十卷。第一卷：群经概论。第二卷：正史考略，诸子略义。第三卷：文心雕龙讲疏。第四卷：文心雕龙注（上）。第五卷：文心雕龙注（下）。第六卷：水经注写景文钞，大丈夫，游击战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七卷：中国通史简编（上）。第八卷：中国通史简编（下）。第九卷：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十卷：文集。

(二)《全集》第一卷至第六卷，系据著者自编的序列编次，不表示写作或出版的先后。第七、八、九卷是四十年代出版的两部名著。著者在1953年至1964年间出版的《中国通史》（原名《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四册，已与续编六册合编新版单行，《全集》不再收录。

(三)各卷所收著作的出版状况和依据的版本，分别在各卷卷首说明。著作内容均保持原貌，不作改动。只对原版排印中的明显错字作了改正。

(四)《全集》所收著作和论文，原来以繁体字、旧字形竖排的，都改以简化字横排。第四、五卷《文心雕龙注》，系属古籍校注，依惯例仍用繁体字，以便检读。

(五)《全集》所收论著，前后历六十余年，其间标点符号的应用和注释方式屡经变动。现在重刊，一律采用通用的标号，但标注方式则力求保持或接近原貌。间或略加变动，免生歧义。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论著不强求划一，与通行惯例也互有异同，读者见谅。

(六)《范文澜全集》是范文澜之子范元维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蔡美彪主持编辑，参加各卷编校工作的人员有：第一卷修晓波，第二卷张德信、张小林，第三卷刘德鸿，第四卷韩志远，第五卷刘德鸿，第六卷刘小萌、韩志远、潘汝暄，第七、八卷韩志远、刘小萌、张小林，第九卷刘小萌，第十卷潘汝暄。

(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9 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收入蔡美彪所撰《范文澜治学录》一文，概述了范文澜的学术成就。现刊于卷首，以代对著者的介绍。

范文澜治学录（代序）

蔡美彪

范文澜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著述生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二十年代初从事学术著述到1939年去延安为第一阶段，1940年抵达延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为第二阶段，建国以后为第三阶段。

一

范文澜最早出版的著作，是在南开大学讲授《文心雕龙》的讲义，题为《文心雕龙讲疏》（1925年10月），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时，音韵、训诂学家黄侃曾讲授《文心雕龙》课程，讲义题为《文心雕龙札记》出版。范文澜就学于黄侃，得其传授，在黄著的基础上，进而广征博引，祛疑解惑，写成《讲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把此讲义送给当时在南开任教的梁启超阅看。梁氏大为赞誉，亲自为本书的出版写了序言。说本书“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此书印数不多，但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范文澜也从此蜚誉士林。

1927年他回北大教书后的几年间，把在北大所学和毕业后十年间的积累作了全面的整理，相继完成了多种学术著述。

他到北大执教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诸子略义》。此书原是在南开时讲授《国学要略》的讲义，“自序”作于1926年12月。出版时间当在1927年末至1928年初，即他在北大授课的第一年。我所见此书的铅字排印本，版心有“京师大学校”、“文科出版课印”等字样。北京大学被北洋军阀政府强制改名为“京师大学校”是在1927年8月。次年6月蔡元培具呈南京政府，请求恢复北京大学校名。此后虽仍有周折，但“京师大学校”的校名即不再沿用。此书应是在此期间授课的讲义，由学校刊印。书名题为《诸子文选》，当是依据开课的名称，但序言仍标《诸子略义序》。他自己提及此书，也还是称为《诸子略义》^①。本书的内容并非诸子文章的选编，而是对诸子学说的评介。自“孔子以前的文化”至两汉诸子，并论及魏晋清谈与“文心雕龙诸子”。他认为先秦诸子流派只有儒墨道三家，其他都是三家的支派。墨家有“别墨”，儒家支派也可称为“别儒”，刑名出于道家，不应“别立法家”。对两汉诸子学的评论，如论《太玄》、《昌言》等，也多发前人所未发。这时的范文澜已在1926年入党，当时的北大，由于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又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师生思想极为活跃，积极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范文澜在本书序言中指出“自儒家独行于中国，学术消沉”，由于“学定一尊”。他赞颂“方今世运更新，数千年来思想之桎梏一旦尽解，学问不受政治之迫压，各得骋其才智，钻研真理。”此书未经出版社出版发行，因而流传不广，仅在北大师生中传播。

1929年8月，范文澜《水经注写景文钞》一书，由北平朴社出版。朴社是顾颉刚创办的学术团体。顾颉刚与范文澜同年生，同年考入北大预科，但因中间患病辍学，1920年才在北大文科毕业，比范文澜晚了三年。1923年他自上海回到北大文研所国学门。1926年编印《古史辨》，形成古史辨学派。范文澜也应邀参加了朴社。此后，顾颉刚曾一度去厦门，1929年又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水经注写景文钞》是一部写景文的选编，范文澜用白话文体

^① 见《与顾颉刚论五行说的起原》，载《史学年报》1931年第3期。

为本书写了序言，突破了黄侃等人反对白话文的“师法”。在这篇序言里，他只用很少的笔墨讲了本书所据的版本，随后便由自然界的景物说到现实社会的不平。他说：“社会好似黑压压一大片野生森林”，“不材恶木繁荣超过一切，良木不免于枯槁。”指责“青山绿水间”，“富贵人”和“伟人”这类人多了，“会被血腥铜臭弥漫着，像大雨前烟雾那样昏暗”。乡下农夫和都市中工人，“备受种种压迫”。序言最后描述他的理想社会是“衣食无虑，贫富不争，机诈消灭，浩浩荡荡努力向着文明路上直奔前进”。这大概是范文澜最早发表的一篇白话文，以富有特色的文笔，生动自然地表述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

1929年9月，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了范文澜的名著《文心雕龙注》的上册和中册。全书分为3册，上册是原书本文和校勘，是传世诸版本与前人校本的集校，中、下册是注释。下册1932年续出。1936年开明书店又把注释分录于各卷本文校勘之后合订再版。在刊印《讲疏》之后，又以汉学家注经的方法，广征博引，考镜源流，著成考订详赡的注释。此书出版后，享誉一时，至今仍被公认为注释此书的巨制。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开明版重印，曾请范文澜为新版写篇序言。他没有同意，只为新版题写了书名。

1931年1月，北平文化学社又出版了他的《正史考略》。这是范文澜第一部历史学或史部目录学著作。前此的出版物大都属于古典文学和哲学范围，所以，他在本书绪言中谦称：“文澜褊陋，未尝学史。窃欲勾杂旧闻，缀为一编。”这是一篇较长的绪言，论述了《春秋》、《左传》以来的史学源流。他认为：司马迁以来的所谓“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学。唐代以后，国史成为官书，修史奉行故事，史学为之无光。这和他在《诸子略义》序言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本书的编写，大体上也是基于他讲授《国学要略》史部和《史通》的讲义，整理修订而成。书中对《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史书，分别作了具体的评介，其间评论得失，多有创意。二十四史以外，又列入了柯绍忞所著《新元史》，此书成于1920年，次年曾由北洋军阀政府徐世昌以大总统令列为正史，称为二十

五史。范文澜在介绍本书时完全不理此事，以示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蔑视。绪言中也只是提到清乾隆时的二十四史，不承认所谓二十五史。对《新元史》一书的介绍方法是：胪列原书本纪目录、卷数，表、志、传的类目、卷数，不作评论，只是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予柯氏博士学位的本书审查报告原文录入。书中特为标出著者署名仍用清翰林院国史馆的职衔，是一种含蓄的指责。柯氏在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至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实任大学经科监督。其间宣统二年（1910年）还曾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33年去世。《正史考略》出版时，柯氏仍然健在。范文澜在书中称他为柯先生，是表示对北大前辈师长的尊重。

1933年10月，范文澜的一部重要著作《群经概论》由北平朴社出版。清末京师大学堂成立初期，曾设经科，后合并于文科。范文澜在校求学时，文科的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人仍然讲授经学课程。范文澜得诸师传授，于经学致力甚殷，毕业后，又在京津各大学先后讲授与经学有关的课程，在此基础上纂成此书。全书分为十三章。第一章为“经名数及正义”，第二章以下分别讲述易、尚书、诗、周礼、乐、仪礼、礼记、春秋及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故名为“群经”。书名“概论”，但并不是概括的评论，而是对诸经的性质、内容、篇目、存逸、真伪及相关诸问题，分别作深入而具体的评述。编纂方法遵依述而不作的宗旨，以汉学家注释经书的体例，旁征博引，解释群经。经学自汉代分为今、古文派，清儒解经之作，浩如烟海，众说纷纭。本书对诸经有关问题，条分缕析，摘引前人精粹之论，彼此贯通，使读者对诸经概况、前人研究成果及问题所在一目了然。新文化运动以来，俗儒的“尊孔读经”已遭摒弃，但经学作为传统的学术仍然不能不是学者需要了解和研究的课题。该书以其具体详赡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范文澜自1927年回北大执教，出版《诸子略义》以来，六年间相继出版著述5种，是他平生著述最勤、出书最多的时期。1929年出版的《水经注写景文钞》曾自题为“范文澜所论第七种”，《文心雕龙注》题为“范文澜所论第四种”，晚出的《群经概论》题为“范

文澜所论第一种”，读者对此或以为费解。这其实表明，他回北大执教后，打算把多年来所学所教的学术作一全面的总结，计划编写一系列的著述。列为第一种的是《群经概论》，第二种是《正史考略》，第三种不见题署，当是北大出版的《诸子略义》，第四种是《文心雕龙注》，第五种当是拟列《文心雕龙讲疏》，出版时尚未题署种次。题署第七种的是《写景文钞》，只有第六种不见着落。范文澜在京津各大学以及后来在河南大学都曾讲授过中国文学史，有讲义印行。吕振羽曾几次和我说起，他早年读过此讲义，颇为赞赏，嘱我设法找到。我曾就此事问过范老。他说当年确曾印过这部讲义，但印数不多，他手边早已无存，不知下落了。由此可知，他在公开出版的几种著作上题署“范文澜所论”第几种，并非依据出版时间先后，而是依据经、史、子、集（文论、文学史、文钞）顺序排比，计划构成一套国学著述系列。只是由于其中三种是作为讲义刊行，迄未能按照原计划出版完帙。

范文澜的系列著作，大多是来源于在北京大学学习和执教时的学术积累。在他的著作中并且经常把北大师长的讲论引录到书中，注明出自某师。最负盛名的《文心雕龙注》不时在注释中引录黄侃、陈汉章的论述，称为“黄先生曰”、“陈先生曰”。书前的例言申明：“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师，陈先生即象山伯弢师。其余友人则称某君，前辈则称某先生，著其姓字，以识不忘。”《群经概论》更多引录黄、陈及刘师培的论述，甚至有时立为一节，注明全出某先生。第一章“唐人正义”节称：“刘申叔先生论正义之得失甚精，兹录其全文如下。”“今古文家法”节注明全出陈伯弢先生。第四章“毛诗词例举”、第九章“左氏学行于西汉考”、“穀梁荀子相通考”等篇注明录自刘申叔先生。“三传平议”注出黄季刚先生。书中论述，引据“某先生曰”，更是数见不鲜。范著中引录当时北大诸先生的讲论，有些已收入他们本人的著作，有些则是讲授的讲义，由于范文澜的引录而得以传世。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文澜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以前北大学习传统国学的最后一班学生，而且是当年北大国学的集其大成的继承人。

范文澜在学术上继承北大的国学传统又融入自己的新思想，形成一系列著作，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阶段。1935年，他再次被捕出狱后，面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日本侵略的威胁，学风与文风为之一变。

1935年冬，他写成《大丈夫》一书，对历史上二十五位抗敌御侮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依据多种记载“审慎稽核，组织成篇”，用生动的语言描述壮烈的事迹，全书充满激情，令人读来为之感动。本书卷首的“凡例”中指出：“一个国家要是政治腐败，民穷财尽，本身既非崩溃不可，外患自然乘虚而入。”本书作为民众教育资料“对于民族精神的提倡，或者多少有些贡献”。“并且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本书在1935年底完成，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取得很大的成功。至1949年3月，先后印行6版，受到广泛的欢迎。

《大丈夫》一书的出版，在范文澜的著作生涯中是一个转折。他作为深研经学和《文心雕龙》的专家转而致力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从继承汉学家法，校勘考释，转而编写贡献于民众教育的深入浅出的读物，为尔后《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开拓了先路。

二

1936年，范文澜因去北平继续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8月间去开封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并参加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封期间，他在《风雨》、《经世》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时事评论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38年6月，开封沦陷，他前往确山竹沟镇，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国民党当局制造竹沟反共事件。这年10月，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他去延安，并亲自写信把他介绍给毛泽东。1940年1月他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范文澜当时以研治经学和《文心雕龙》著名于世，这年夏季延安新哲学年会邀约范文澜在新建

的延安大礼堂作经学史讲演。先后讲演三次。前两次，毛泽东都亲自来听讲，第三次因病未去，看过讲演提纲后亲自写信给范文澜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①范文澜的这个讲演提纲，曾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发表于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

与此约略同时，他开始了《中国通史简稿》一书的编写。当时的形势是，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基于这种需要，范文澜受党中央的委托，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他作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组织研究室的人员集体编写。按朝代顺序，分工起草。范文澜追记说：“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一九四〇年八月至第二年四五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②所以，本书出版时虽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立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

本书的编写宗旨和特定的需要，都要求编者不能沿用旧有的历史著作或教科书的编写成例，而必须自辟蹊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等学者曾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也有一些专论刊布。但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整个历史的全面贯通的著述，还是前此所未有。范文澜曾说：本书属于“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的历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3页。

^②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载《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版。